

20 世纪最后 20 年中国文学
作品选散文卷

北 京 大 学 出 版 社
一 九 九 九 年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书 名：20 世纪最后 20 年中国文学作品选散文卷

著作责任者：

责任编辑：

标准书号：ISBN 7-301-7 ·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址：<http://cbs.pku.edu.cn/cbs.htm>

电话：出版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4140 编辑室 62752025

电子信箱：zpup@pup.pku.edu.cn

排版者：北京军峰公司

印刷者：北京大学印刷厂

发行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销者：新华书店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印张 千字

1999 年 月第一版 1999 年 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 元

目 录

1979

太阳下的风景	黄永玉()
拣麦穗	张 洁()

1980

梵·高	吴冠中()
-----------	--------

1981

十年一梦	巴 金()
------------	--------

1982

静虚村记	贾平凹()
------------	--------

1983

梦中的天地	陆文夫()
-------------	--------

1984

泡茶馆	汪曾祺()
昆明的雨	汪曾祺()
巩乃斯的马	周 涛()
高原,我的中国色	乔 良()

1985

纤 痕 廖静仁()

1986

回忆我的姑母 杨 绛()

大弥撒之思 韩少华()

总是难忘 苏 叶()

女孩子的花 唐 敏()

1987

“ 文革 ”杂忆 萧 乾()

祖父张伦 张中行()

床虱 黄苗子()

心烟 舒 婷()

四季的回响 高红十()

1988

闲人 贾平凹()

惶惑六重奏 楼肇明()

午夜的鞍子 张承志()

表舅母 斯 妤()

1989

斯德哥尔摩的钟声 阎纯德()

岛人笔记 赵丽宏()

妇人 梅绍静()

1990

草戒指	铁 凝()
悠悠心会	韩小蕙()
鼠王	钟 鸣()

1991

我到了北京	冰 心()
三松堂断忆	宗 璞()
我与地坛	史铁生()
致先生书	张承志()
仁山智水	舒 婷()
聆听西藏	扎西达娃()
最后的海菲兹	肖复兴()
大地上的事情	苇 岸()
夤夜不再回头	王开林()
马车的影子	张锐锋()

1992

断梦编年	邵燕祥()
思念海子	谢 冕()
秋凉偶记	芸 斋()
中国风景个性	余树森()
寻找姚元之	高洪波()
幻想三题	斯 妤()
寂寞的天	冯秋子()
鸩杀	钟 鸣()

1993

- 融入野地 张 炜()
我不能没有月亮 叶 梦()
东山岛梦蝶 毛志成()

1994

- 乡关何处 余秋雨()
遥远的绝响 余秋雨()
九零年冬 赵 玫()

1995

- 秀发飘散 杜 丽()
脆弱的器皿 杜 丽()
水果女人 张爱华()
皋兰夜话 雷 达()
听秦腔 雷 达()

1996

- 三个小女孩 季羨林()

1997

- 上海小姐 陈丹燕()

1979

太阳下的风景

黄永玉

从十二岁出来,在外头生活了将近四十五年,才觉得我们那个县城实在是太小了。不过,在天涯海角,我都为它而骄傲,它就应该是那么小,那么精致而严密,那么结实。它也实在是太美了,以致以后的几十年我到哪里也觉得还是我自己的故乡好;原来,有时候,还以为可能是自己的偏见。最近两次听到新西兰的老人艾黎说:“中国有两个最美的小城,第一是湖南凤凰,第二是福建长汀……”他是以一个在中国生活了将近六十年的老朋友说这番话的,我真是感激而高兴。

我那个城,在湘西靠贵州省的山洼里。城一半在起伏的小山坡上,有一些峡谷,一些古老的森林和草地,用一道精致的石头城墙上上下下地绣起一个圈来圈住。圈外头仍然那么好看,有一座大桥,桥上层叠着二十四间住家的房子,晴天里晾着红红绿绿的衣服,桥中间是一条有瓦顶棚的小街,卖着奇奇怪怪的东西。桥下游的河流拐了一个弯,有学问的设计师在拐弯的地方使尽了本事,盖了一座万寿宫,宫外左侧还点缀一座小白塔。于是,成天就能在桥上欣赏好看的倒影。

城里城外都是密密的、暗蓝色的参天大树,街上红石板青石板铺的路,路底有下水道,蔷薇、木香、狗脚梅、桔柚,诸多花果树木往往从家家户户的白墙里探出枝条来。关起门,下雨的时候,能听到穿生牛

皮钉鞋的过路人叮叮叮地从门口走过。还能听到庙中建筑四角的“铁马”风铎叮叮当当的声音,下雪的时候,尤其动人,因为经常一落即有二尺来厚。

最近我在家乡听到一个苗族老人这么说,打从县城对面的“累烧坡”半山下来,就能听到城里“哄哄哄”的市声,闻到油炸粑粑的香味道。实际上那距离还在六七里之遥。

城里多清泉,泉水从山岩石缝里渗透出来,古老的祖先就着石壁挖了一眼一眼壁炉似的竖穹,人们用新竹子做成的长勺从里头将水舀起来。年代久远,泉水四周长满了羊齿植物,映得周围一片绿,想起宋人赞美柳永的话:“有井水处必有柳词”,我想,好诗好词总是应该在这种地方长出来才好。

我爸爸在县里的男小学作校长,妈妈在女小学作校长。妈妈和爸爸都是在师范学校学音乐美术的,不知道什么时候爸爸用他在当地颇为有名气的拿手杰作通草刻花作品去参加了一次“巴拿马赛会”(天晓得是一次什么博览会),得了个铜牌奖,很使他生了一次大气(他原冀得到一块大金牌的)。虽然口味太高,这块铜牌奖毕竟使他增长了怀才不遇的骄傲情绪。这个人一直是自得其乐的;他按得一手极复杂的大和弦风琴,常常闭着眼睛品尝音乐给他的其他东西换不来的快感。以后的许多潦倒失业的时光,他都是靠风琴里的和弦与闭着眼睛渡过的。我的祖母不爱听那些声音,尤其不爱看我爸爸那副“与世无争随遇而安”的神气,所以一经过噪聒的风琴旁边时就嘟嘟囔囔,说这个家就是让这部风琴弄败的。可是这风琴却是当时本县唯一新事物。

妈妈一心一意还在做她的女学校校长,也兼美术和音乐课,从专业上说,她比爸爸差多了,但人很能干,精力尤其旺盛。每个月都能从上海、北京收到许多美术音乐教材。她教的舞蹈很出色而大胆的,记得因为舞蹈是否有伤风化的问题和当地的行政长官狠狠地干过几仗,而都是以胜利告终。她第一个剪短发,第一个穿短裙,也鼓励她

的学生这么做。在当时的确是颇有胆识的。

电影《早春二月》那些歌，那间学校，那几位老师，那几株桃花李花，多么像我们过去的生活！

再过一段时候，爸爸妈妈的生活就寥落了，从外头回来的年轻人代替了他们。他们消沉，难过，以为是某些个人对他们不起。他们不明白这就是历史的规律，后浪推前浪啊！不久，爸爸到外地谋生去了，留下祖母和妈妈支撑着摇摇欲坠的自古相传的“古椿书屋”。每到月底，企盼着从外头寄回来的一点点打发日子的生活费。

有一天傍晚，我正在孔庙前文星街和一群孩子进行一场简直像真的厮杀的游戏，忽然一个孩子告诉我，你们家来了个北京客人！

我从来没亲眼见过北京客人。我家有许许多多北京、上海的照片，那都是我的亲戚们寄回来让大人们觉得有意思的东西。对孩子来说，它又不是糖，不是玩意，看看也就忘了。这一次来的是真人，那可不是个随随便便的事。

这个人 and 祖母围着火炉膛在矮凳上坐着，轻言细语他说着话，回头看见了我。

“这是老大吗？”那个人问。

“是呀！”祖母说，“底下还有四个咧！真是旺丁不旺财啊！”

“喂！”我问，“你是北京来的吗？”

“怎么那样口气？叫二表叔！”祖母说，“是你的从文表叔！”

我笑了，在他周围看了一圈，平平常常，穿了件灰布长衫。

“嗯……你坐过火车和轮船？”

他点点头。

“那好！”我说完马上冲出门去。继续我的战斗。一切一切就那么淡漠了。

几年以后，我将小学毕业，妈妈叫我到四十五里外的外婆家去告穷，给骂了一顿，倒也在外婆家住了一个多月。有一天，一个中学生和我谈了一些很深奥的问题，我一点也不懂，但我马上即将小学毕

业,不能在这个中学生面前丢人,硬着头皮装着对答如流的口气问他,是不是知道从凤凰到北京要坐几次轮船和几次火车?

他好像也不太懂,这教我非常快乐。于是我又问他知道不知道北京的沈从文?他是我爸爸的表弟,我的表叔。

“知道!他是个文学家,写过许多书,我有他的书,好极了,都是凤凰口气,都是凤凰事情,你要不要看?我有,我就给你拿去!”

他借的一本书叫做《八骏图》,我看了半天也不懂,“怎么搞的?见过这个人,又不认得他的书?写些什么狗皮唠糟的事?老子一点也不明白……”我把书还给那个中学生。

“怎么样?”

“唔,唔,唔。”

许多年过去了。

我流浪在福建德化山区里,在一家小瓷器作坊里做小工。我还不明白世界上有一种叫做工资的东西,所以老板给我水平极差的三顿伙食已经十分满足。有一天,老板说我的头发长得已经很不成话,简直像个犯人的时候,居然给了我一块钱。我高高兴兴地去理了一个“分头”,剩下的七角钱在书店买了一本《昆明冬景》。

我是冲着沈从文三个字去买的。钻进阁楼上又看了半天,仍然是一点意思也不懂。这我可真火了。我怎么会一点也不懂呢?就这么七角钱!你还是我表叔,我怎么一点也不明白你在说些什么呢?七角钱,你知不知道我这七角钱要派多少用场?知不知道我日子多不好过?我可怜的七角钱……

德化的跳蚤很多,摆一脸盆水在床沿下边,身上哪里痒就朝哪里抓一把,然后狠狠往床下一摔,第二天,黑压压一盆底跳蚤。

德化出竹笋,柱子般粗一根,山民一人扛一根进城卖掉买盐回家。我们买来剥成丁子,抓两把米煮成一锅清粥,几个小孩一口气喝得精光,既不饱,也不补人,肚子给胀了半天,胀完了,和没有吃过一样。半年多,我的大腿跟小腿都肿了起来,脸也肿了;但人也长大了。

.....

我是在学校跟一位姓吴的老师学的木刻，我那时是很自命不凡的，认为既然刻了木刻，就算是有了一个很好的倾向了。听说金华和丽水的一个木刻组织出现，就连忙把自己攒下来的一点钱寄去，算是入了正道，就更是自命不凡起来。而且还就地收了两个门徒。

堪惋惜的是，那两位好友其中之一给拉了壮丁，一个的媳妇给保长奸污受屈，我给他俩报了仇，就悄悄地离开了那个值得回忆的地方，不能再回去了。

在另一个地方遇见了一对夫妇，他们善心地收留我，把我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照顾，这个家真是田园诗一样善良和优美。我就住在他们极丰富的书房里，那些书为我所有，我贪婪地吞嚼那些广阔的知识。两夫妇给我文化上的指引，照顾我受过伤的心灵，深怕伤害了我极敏感的自尊心，总是小心地用商量的口气推荐给我系统性的书本。

“你可不可以看一下威尔斯的《世界史纲》，你掌握了这一类型的各种知识，就会有一个全局的头脑。你还可以看看他写书的方法.....

“我觉得你读一点中外的历史，文化史，你就会觉得读起别的书来更有本领，更会吸收.....

“.....莱伊尔的《普通地质学》和达尔文《在贝尔格军舰上的报告书》之类的书，像文学一样有趣，一个自然科学家首先是个文学家这多好！是不是？

“.....波特莱尔是个了不起的诗人，多聪明机智，是不是？但他的精神上是有病的，一个诗人如果又聪明能干，精神又健康多好！

“不要光看故事，你不是闲人；如果你要写故事，你怎么能只做受感动的人呢？要抓住使人感动的许许多多的艺术规律，你才能够干艺术工作。你一定做得到.....”

将近两年，院子的红梅花开了两次，我背着自己做的帆布行囊远远的走了，从此没有再回到那个温暖的家去。他们家的两个小孩都

已长大成人,而且在通信中知道还添了一个美丽的女孩。这都是将近四十年前的往事了。我默祷那些活着的和不在人世的善良的人过得好,好人迟早总是有好报的,遗憾的是,世上的许多好人总是等不到那一天……

在两位好人家里的两年,我过去短短的少年时光所读的书本一下子都觉醒了,都活跃起来。生活变得那么有意思,几乎是,生活里每一样事物,书本里都写过,都歌颂或诅咒过。每一本书都有另一本书作它的基础,那么一本一本串联起来,自古到今,成为庞大的有系统的宝藏。

以后,我拥有一个小小的书库,其中收集了从文表叔的几乎全部的著作。我不仅明白了他书中说过的话,他是那么深刻地了解故乡土地和人民的感情,也反映出他青少年时代储存的细腻的观察所得和丰富的语言积累,对以后创作起了了不起的作用。对一个小学未毕业的人来说,这几乎是奇迹;而且坚信,人是可以创造奇迹的。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只身来到上海,生活困难得相当可以了,幸好有几位前辈和好友帮助和鼓舞,正如伊壁鸠鲁说过的,“欢乐的贫困是美事”,工作还干得颇为起劲。先是在一个出版社的宿舍跟一个朋友住在一起,然后住到一座庙里,然后又在一家中学教音乐和美术。那地方在上海的郊区,每到周末,我就带着一些刻好的木刻和油画到上海去,给几位能容忍我当时年轻的狂放作风的老人和朋友们去欣赏。记得曾经有过一次要把油画给一位前辈看看的时候,才发现不小心早已把油画遗落在公共汽车上了。生活穷困,不少前辈总是一手接过我的木刻稿子,一手就交出了私人垫的预支稿费。记得一位先生在一篇文章里写过这样的话,“大上海这么大,黄永玉这么小!”天晓得我那时才二十一岁。

我已经和表叔沈从文开始通信。他的毛笔蝇头行草是很著名的,我收藏了将近三十年的来信,好几大捆,可惜在令人心疼的前些日子,都散失了。有关传统艺术系统知识和欣赏知识,大部分是他给

我的。那一段时间,他用了许多精力在研究传统艺术,因此我也沾了不少的光,他为我打开了历史的窗子,使我有机会沐浴着祖国伟大传统艺术的光耀。在一九四六还是四七年,他有过一篇长文章谈我的父母和我的行状,与其说是我的有趣的家世,不如说是我们乡土知识分子在大的历史变革中的写照。表面上,这文章有如山峦上抑扬的牧笛与江流上浮游的船歌相呼应的小协奏,实质上,这文章道尽了旧时代小知识分子,小山城相互依存的哀哀欲绝的悲惨命运。我在傍晚的大上海的马路上买到了这张报纸,就着街灯,一遍又一遍地读着,眼泪湿了报纸,热闹的街肆中没有任何过路的人打扰我,谁也不知道这哭着的孩子正读着他自己的故事。

朋友中,有一个是他的学生,我们来往得密切,大家虽穷,但都各有一套蹩脚的西装穿在身上。记得他那套是白帆布的,显得颇有精神。他一边写文章一边教书,而文章又那么好,使我着迷到了极点。人也像他的文章那么洒脱,简直是浑身的巧思。于是我们从“霞飞路”来回地绕圈,话没说完,又从头绕起。和他同屋的是一个报社的夜班编辑,我就睡在那具夜里永远没有主人的铁床上。床年久失修,中间凹得像口锅子,据我的朋友说,我窝在里面,甜蜜得像个婴儿。

那时候我们多年轻,多自负,时间和精力像希望一样永远用不完。我和他时常要提到的自然是“沈公”,我认为,最了解最敬爱他的应该是我这位朋友。如果由他写一篇有关“沈公”的文章,是再合适也没有的了。

在写作上,他文章里流动着从文表叔的血型,在文字功夫上他的用功使当时大上海许多老人都十分惊叹。我真是为他骄傲。所以我后来不管远走到哪里,常常用他的文章去比较我当时读的另一篇文章是不是蹩脚。

在香港,我呆了将近六年。在那里欢庆祖国的解放。与从文表叔写过许许多多的信。解放后,他是第一个要我回北京参加工作的人。不久,我和梅溪背着一架相机和满满一皮挎包的钞票上北京来

探望从文表叔和婶婶以及两个小表弟了。那时他的编制还在北京大学而人已在革命大学学习。记得婶婶在高师附中教书。两个表弟则在小学上学。

我们呢！年轻到了家，各穿着一套咔叽布衣服。充满了简单的童稚的高兴。见到民警同志也务必上前问一声好，热烈地握手。

表叔的家在沙滩中老胡同宿舍。一位叫石妈妈的保姆料理家务。我们发现在北方每天三餐要吃这么多面食而惊奇不止。

我是一个从来不会深思的懒汉。因为“革大”在西郊，表叔几乎是“全托”，周一上学，周末回来，一边吃饭一边说笑话，大家有一场欢乐的聚会。好久我才听说，表叔在革大的学习，是一段非常奇妙的日子。他被派定要扭秧歌，要过组织生活。有时凭自己的一时高兴，带了一套精致的小茶具去请人喝茶时，却受到一顿奚落。他一定有很多作为一个老作家面对新事物有所不知，有所彷徨困惑的东西，为将要舍弃几十年所熟悉用惯的东西而深感惋惜痛苦。他热爱这个崭新的世界，他正确地估计到将有一番开拓式的轰轰烈烈，旷古未有的文化大发展，这与他素来的工作方式很对胃口。他热爱祖国的土地和人民，但新的社会新的观念对于他这个人能有多少了解？这需要多么细致的分析研究，而谁又能把精力花在这么微小的个人哀乐上呢？在这个大时代里多少重要的工作正等着人做的时候……

在那一段日子里，从文表叔和婶婶一点也没有让我看出生活中所发生的重大的变化。他们亲切地为我介绍当时还健在写过《玉君》的杨振声先生，写过《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的废名先生，至今生气勃勃，老当益壮的朱光潜先生，冯至先生。记得这些先生当时都住在一个大院子里。

两个表弟那时候还戴着红领巾，我们四人经过卖冰棍摊子时，他们还客气地做出少先队员从来不嗜好冰棍的样子。使我至今记忆犹新。现在他们的孩子已经跟当时的爸爸一般大了，真令人唏嘘……

我们在北京住了两个月不到就返回香港，通信中知道表叔已在

“革大”毕业，并在历史博物馆开始新的工作。

两年后，我和梅溪就带着七个月大的孩子坐火车回到北京。

那是北方的二月天气。火车站还在大前门东边，车停下来，一个孤独的老人站在月台上迎接我们。我们让幼小的婴儿知道：“这就是表爷爷啊！”

从南方来，我们当时又太年轻，什么都不懂，只用一条小小的薄棉绒毯子包裹着孩子，两只小光脚板露在外边，在广东，这原是很习见的做法，却吓得老人大叫起来：

“赶快包上，要不然到家连小脚板也冻掉了……”

从文表叔十八岁的时候也是从前门车站下的车，他说他走出车站看见高耸的大前门时几乎吓坏了！

“啊！北京，我要来征服你了……”

时间一晃，半个世纪过去了。

比他晚十年，我二十八岁才来到北京。

时间是一九五三年二月。

我们坐着古老的马车回到另一个新家，北新桥大头条十一号，他们已离开沙滩中老胡同两年多了。在那里，我们寄居下来。

从文表叔一家老是游徙不定。在旧社会他写过许多小说，照一位评论家的话说，“叠起来有两个等身齐”。那么，他该有足够的钱去买一套四合院的住屋了，没有；他只是把一些钱买古董文物，一下子玉器，一下子宋元旧锦，明式家具……精精光。买成习惯，也送成习惯，全搬到一些博物馆和图书馆去。有时连收条也没有打一个。人知道他无所谓，索性捐赠者的姓名也省却了。

现在租住下的房子很快也要给迁走的。所以住得很匆忙，很不安定，但因为我们的到来，他就制造一副长住的气氛，免得我们年轻的远客惶惑不安。晚上，他陪着我刻木刻，看刀子在木板上运行，逐渐变成一幅画。他为此而兴奋。轻声地念道一些鼓励的话。……

他的工作是为展品写标签，无须乎用太多的脑子。但我为他那

精密之极的脑子搁下来不用而深深惋惜。我多么地不了解他,问他为什么不写小说;粗鲁地逼迫有时使他生气。

一位我们多年尊敬的,住在中南海的同志写了一封信给他,愿意为他的工作顺利出一点力气。我从旁观察,他为这封回信几乎考虑了三四年,事后恐怕始终没有写成。凡事他总是想得太过朴素,以致许多年的话不知从何谈起。

保姆石妈妈的心灵的确像块石头。她老是强调从文表叔爱吃熟猪头肉夹冷馒头。实际上这是一种利用老人某种虚荣心的鼓励,而省了她自己做饭做菜的麻烦。从文表叔从来是一位精通可口饭菜的行家,但他总是以省事为宜,认为过分的吃食浪费时间。每次回家小手绢里的确经常胀鼓鼓地包着不少猪头肉。

几十年来,他从未主动上馆子吃过一顿饭,没有这个习惯。当他得意地提到有限的几次宴会时——徐志摩、陆小曼结婚时算一次,郁达夫请他吃过一次什么饭算一次,另一次是他自己结婚。我没有听过这方面再多的回忆。那些日子距今,实际上已有半个世纪。

借用他自己的话说:

“美,总不免有时叫人伤心……”

什么力量使他把湘西山民的朴素情操保持得这么顽强。真是难以相信,对他自己却早已习以为常。

我在中央美术学院教学的工作一定,很快地找到了住处,是在北京东城靠城边的一个名叫大雅宝的胡同,宿舍很大,一共三进院子,头一间房子是李苦禅夫妇和他的岳母,第二间是董希文一家,第三间是张仃夫妇,然后是第二个院子,第一家是我们,第二家是柳维和,第三家是程尚仁。再是第三个院子,第一家是李可染,第二家是范志超,第三家是袁迈,第四家是彦涵,接着就是后门了。院子大约有大大小小三十多个孩子,一来我们是刚从香港回来的,行动和样子都有点古怪,引起他们的兴趣;再就是平时我喜欢跟孩子一道,所以我每天有一部分时间跟他们在一起。我带他们一道玩,排着队,打着扎上

一条小花手绢的旗帜上公园去。现在,这些孩子都长大了,经历过不少美丽和忧伤的日子,直到现在,我们还保持了很亲密的关系。

我搬家不久,从文表叔很快地搬了家,恰好和我们相距不远,他们有三间房,朝南都是窗子,卧室北窗有一棵枣树横着,影着蓝天,真是令人难忘。

儿子渐渐长大了,每隔几天三个人就到爷爷家去一趟。爷爷有一具专装食物的古代漆柜子,儿子一到就公然地面对柜子站着,直到爷爷从柜子里取出点什么大家吃吃为止。令人丧气的是,吃完东西的儿子马上就嚷着回家,为了做说服工作每一次都要花很多工夫。

从文表叔满屋满床的画册书本,并以大字报的形式把参考用的纸条条和画页都粘在墙上。他容忍世界上最噜苏的客人的马拉松访问,尤其仿佛深怕他们告辞,时间越长,越热情越精神的劲头使我不解,因为和我对待生熟朋友的情况竟如此相似。

有关于民族工艺美术及其他史学艺术的著作一本本出来了,天晓得他用什么时间写出来的。

婶婶像一位高明的司机,对付这么一部结构很特殊的机器,任何情况都能驾驰在正常的生活轨道上,真是神奇之至。两个人几乎是两个星球上来的人,他们却巧妙地走在一道来了。没有婶婶,很难想象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又要严格,又要容忍。她除了承担全家运行着的命运之外,还要温柔耐心引导这长年不驯的山民老艺术家走常人的道路。因为从文表叔从来坚信自己比任何平常人更平常。所以形成一个几十年无休无止的学术性的争论。婶婶很喜欢听我讲一些有趣的事和笑话,往往笑得直不起身。这里有一个秘密,作为从文表叔文章首席审查者,她经常为他改正许多笔误。婶婶一家姐妹的书法都是非常精采的,但她谦虚到了腼腆的程度,面对着称赞往往像是身体十分不好受起来,使人简直不忍心再提起这件事。

那时候,《新观察》杂志办得正起劲,编辑部的朋友约我为一篇文章赶着刻一幅木刻插图。那时候年轻,一晚上就交了卷。发表了,自